

北京市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人口流动 与语言适应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三

RENKOU LIUDONG YU YUYAN SHIYING
BEIJING SHAOSHUMINZU SHEQU JI JIATINGYUYAN DIAOCHAYANJIU ZHISAN

丁石庆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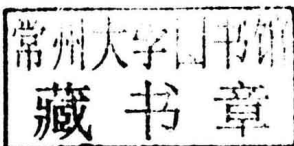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北京市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人口流动与语言适应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三

丁石庆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流动与语言适应/丁石庆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7. 10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3)

ISBN 978 - 7 - 105 - 15069 - 4

I. ①人… II. ①丁… III. 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文化语言学—研究—北京 IV. ①C924. 251 ②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7610 号

人口流动与语言适应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三

著 者:丁石庆主编

责任编辑:黄 勤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215 千字

印 张:14.75

定 价:4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5069 - 4/C · 398(汉 31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投稿热线:010-58130111 1092781806@qq.com;发行部:010-64211734)

RENKOULIUDONG YU YUYANSHIYING
BEIJING SHAOSHUMINZU SHEQU JI JIATINGYUYAN DIAOCHAYANJIU ZHISAN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社会流动人口个案调查研究

第一章 蒙古族个案调查研究	21
第一节 调查概述	21
第二节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25
第三节 个案访谈	32
第四节 分 析	38
第二章 维吾尔族个案调查研究	45
第一节 调查概述	45
第二节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48
第三节 语言观与文化观	58
第四节 结 语	61
第三章 傣族个案调查研究	64
第一节 调查概述	64
第二节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69

第三节 讨 论	79
---------------	----

第二部分 大学生个案调查研究

第四章 蒙古族个案调查研究	93
第一节 调查概述	93
第二节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95
第三节 与打工族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	99
第五章 维吾尔族个案调查研究	104
第一节 调查概述	104
第二节 样本数据统计与分析	105
第三节 结 语	121
第六章 哈萨克族个案调查研究	123
第一节 调查概述	123
第二节 样本的统计与分析	125
第三节 结 语	142
第七章 壮族个案调查研究	144
第一节 调查概述	144
第二节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148
第三节 语言态度	158
第四节 城市环境对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的影响	164
第五节 讨 论	166

第三部分 特殊人口流动场所个案调查研究

第八章 中华民族园个案调查研究	177
第一节 调查概述	177

第二节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179
第三节 羌族语言适应个案分析	188
第四节 白族与蒙古族语言适应个案分析	195
附 录	209
一、北京市少数民族社会流动人口语言调查问卷	209
二、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调查问卷	215
后 记	229

绪 论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在我国，人口流动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人口发展趋势及历史潮流，由此形成的区域间、不同民族间的杂居成为历史事实。而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问题则是较为特殊的现象。一般来说，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固定的生活区域和环境，没有特殊情况大都生活在自己原来固定的生活区域内。流动对少数民族来说意义非同一般。总体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是局部的，是非主流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普遍且引人注目的现象。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中国的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利益关系互动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过去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也出现了日益发展的族际人口互动现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流动现象持续发展，尤其是移居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少数民族人口逐年增加。

我国族际人口流动，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作用下的

各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相互融通及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少数民族在异域他乡适应都市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虽然总体上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在全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其面临的许多问题具有一般人口流动所难以涵盖的特殊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居住呈相对集中的趋势,并自发形成了不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

研究进入城市并作为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之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般规律,关注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及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如何克服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和民族差异带来的语言及其他方面的障碍等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城市化的生活,解决他们生活和心理上的一系列问题,对做好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各具特色,情况也较为复杂。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内地大中城市,他们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语言适应问题。语言适应是文化适应的重要基础,如果语言适应不顺利,会导致生活、学习、工作等一系列的不适应,甚至还会形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以在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语言适应为例,他们要同时面对汉语普通话的学习与适应、母语与传统文化的保持与适应、双语及多语的适应及多元文化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语言适应问题极富理论探讨价值与实践应用意义。

目前研究北京地区各种人文社会问题的有关科研项目中,较少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而其中涉及北京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语言适应论题的研究更是几近空白。因此,上述问题的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北京市少数民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研究的系列工程立项,数年来对多个社区环境开展了语言专题层面的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呈现了课题组前期积累的材料与思考,同时客观上也达到了培养专业

人才、突出学科特色等效果。课题调查研究重点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以下几类人群：大学生，从事餐饮、美容等行业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京漂”的少数民族人士等。其中，以聚居于魏公村周边地区及中华民族园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为重中之重。在调查过程中，如何与被调查对象进行零距离接触，顺利地完成任务的调研工作，尤其是与那些初到国际化大都市仍存在语言障碍与环境适应等诸多困难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交流，获取必要的相关信息等是本研究的难点之一。此外，如何对获取的各种调查材料进行客观和科学的分析，并为相关部门提出一个针对在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与文化适应等诸多方面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也颇具挑战意义。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该项目的选题及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填补学界相关研究领域之空白。此外，在研究进程中，起用了一批在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并把各种具体调查研究任务落实到人头，实行子项目负责制。这对参与研究的研究生来说，是一次绝好的锻炼与实践机会，同时对学科建设来说，无疑是一次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探索过程。

二、相关概念

（一）流动人口

关于流动人口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一般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国际上称为“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tion）。流动人口可分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流入人口是指来到该地区的非本地人口，流出人口是指离开该地区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本地人口。从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可将其分为常住流动人口〔一般五年（含五年）以上〕和短期流动人口。

流动与迁移是两种相似但又有区别的现象，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虽然都进行空间的位移，但是迁移是在永久变更居住地意向指导下的一种活动。根据美国地理学家 W. 泽林斯基的系统归纳，有史以来人口移动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会出现不同的类型：一般在发展前

阶段的传统社会中,流动人口从规模上和发生范围上都很小,仅限于社会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动等有限的几种类型。进入发展阶段后,流动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类型更加多样,甚至流动人口结构也开始出现分化。至发达阶段后,由于交通条件的完善,流动将取代迁移的一部分功能,使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流动的成因将偏重于经济和娱乐成分。^①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下,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某种程度上又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我们认为,流动人口的概念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流动人口包括迁移和流动的人口,而狭义的流动人口则仅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本书采用的基本上是流动人口的狭义概念。

流动人口的分类目前也无统一的定义,为研究方便,本书将流动人口分为三类:精英型,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专长的人才,如科研专家、高级管理人员等高素质人才,也包括部分在企业或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白领阶层人士等;求学型,指正在接受教育的在校生,如中学生、大专生和研究生等;务工型,指通过自谋职业等途径来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此类人员的来源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包括建筑工人、餐饮业人员、环卫保洁人员、家政人员等,其中也包括部分居无定所、流动性较大的个体劳动者。

(二) 语言适应

语言适应(Language adaptation)也译作“言语适应”“语言顺应”等,指说话者改变或掩饰自己的身份以期更被受话人接受的一种努力。语言适应理论由柴尔斯(柴尔斯等,1997)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②,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原则、社会交换原则、归因原则和群体特征原则。相似吸引原则指在交际中说话人(addresser)的话语与受话人(addressee)的话语越相似,对受话人越具吸引力,受话人越容易理解。社会交换原则指说话人在采取某一会话策略

① Zelinsky W. A Prologue to Population Geography (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6; 参见张文新:《美国人口地理学的近期进展》,载《人文地理》,2001(1)。

② 参见刘正光:《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述评》,载《语言文字应用》,2001(2)。

时权衡利弊得失,希望利大于弊,因为言语趋同有可能使说话人的社会身份特征受到威胁和损失。归因原则指人们对他人的言语行为一般都要追究其动机和原因。

库尔马斯(1989)在其主编的《语言适应》(*Language Adaptation*)一书中进行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他认为适应是个过程,不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因为语言反映语言社区的社会现实,因此语言不但要能满足特定的交际需要,还必须能胜任语言交际中的所有需要。即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必须能充分履行某一语言社区的各种交际功能。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在于它们的语言使用方式和履行的交际功能不同。当由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语言突然被赋予新的任务时,语言会突然显得力不从心,不能履行其应该承担的功能。这种社会的发展和语言变化的不同步性要求语言必须不断地适应新的交际要求,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否则一种语言就有可能消亡或被取代。任何语言都必然经历不断适应的过程。适应得越好的语言就越有可能成为越重要的语言,如英语、德语和日语等。它们比较适应现代教育、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管理等现代交际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语言现在需要适应,是因为它们还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就整体而言,宏观上的语言适应是个逐渐的、连续的、悄然的(*unnoticed*)过程,由客观因素催化产生。但是在出现语言危机时,主观干预是必要的。此时,语言适应成了政治目的。如为了保持语言的统一性、准确性、高雅性和纯洁性。充分适应是动态的,具有潜在的可变性。语言适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语言社区的意志。^①

语言适应可分为短时适应和长时适应。短时适应指在某一特定的交际场合,说话人根据受话人的情况对自己的言语(包括用词、语速、语法和语音等)所进行的临时调整,说话人可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言语趋同、言语趋异或语言保持(不改变自己的言语习惯)不同的策略。长时适应指一个人移居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后为达到融入其中

^① 《研究有关言语适应理论》,引自《无忧论文网》, <http://www.51lunwen.com/englishothers/2001/0509/lw201105091010225052.html>。

的目的,有意识地或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口音向新地区的口音靠拢,或者学会新地区的口音、方言或语言。

本书所采用的语言适应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是指 Giles 等人的“说话人改变或掩饰自己的身份以期更被听话人接受的一种努力”^①,也包括语言要素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根据话题、对象、情境的不同所发生的语言选择与语言变异。研究语言适应问题,中国具备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条件,各少数民族的丰富语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但遗憾的是以少数民族语言为对象而进行的语言适应研究没有充分展开。因此,本研究将在努力掌握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适应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探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适应相关论题,为学界提供鲜活的个案分析样本,并以此向学界及有相关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和读者们求教。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充分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手段,采用抽样调查、入户访谈、座谈、问卷等多种方式,对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傣、壮、羌、白等在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语言适应及文化适应等论题的分析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历史与现实兼顾、语言学与其他学科方法并重、微观调查个案与宏观理论分析关照等原则。并竭力在调查和分析等方面做到客观全面与深入详细,并为后续的解释性研究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 问卷调查

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我们进行了语言适应专题的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在京部分少数民族各类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情况、入京后语言使用的变化、语言适应的过程、适应方法及策略、语言态度等。根据在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特点,我们分别设计了针对不同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等。

^① 引自刘正光:《言语适应理论述评》,载《语言文字适应》,2001(2)。

（二）访谈

由于问卷调查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所以选择一些合适的对象进行随访和深度专访是十分必要的。在调查进程中，我们在收集问卷的同时，关注某些被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另类”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答案，并将此类人群选定为随访或专访对象进行回访。

（三）参与观察

在对所收集的问卷、访谈资料做汇总和数据分析的同时，我们也注意了自然场景下人们的语言使用，个别课题还以跟踪录音等方式采集相关语料，以参与观察的例证进一步补充了问卷和访谈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四）课题研究前期成果简介

本课题负责人曾经主持和组织过多项科研项目，具有大型科研课题顶层设计与策划以及具体实施项目计划的经验与能力，兼具较强的团队合作攻关与应变能力。30多年来，长期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社会调查与实际工作经验。尤其自2004年，主持北京市少数民族社区与家庭语言情况调查研究工作以来，与北京市民委、北京市少数民族联谊会的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建立了较好的联系，并获得北京市民委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已经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3部专著，分别是：丁石庆主编的《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一》（民族出版社，2007年）、《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及相关分析——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二》（民族出版社，2012年）和丁石庆主编、申慧淑著的《城市朝鲜族语言适应研究——以北京市朝鲜族流动人口为例》（民族出版社，2013年）。此外，指导的《在京蒙古族流动人口的语言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海淀区蒙古族两类流动人口调查材料为例》、《北京市傣族流动人口的语言适应和身份认同——以魏公村傣族流动人口调查材料为例》数篇硕士学位论文均与本研究论题直接相关。

四、北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语言适应情况概述

(一)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的历史及现状

北京因历史上曾被多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而经历了无数次大的人口迁移,这些为北京少数民族社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辽代将北京作为陪都,称为燕京,金代称为中都,元代称为大都。到了清代,大批北方少数民族入驻中原与北京,并长期在稳定的区域内生活,逐渐形成了民族聚居村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7年始,北京市先后成立了六个民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转山子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东黄梁满族乡和檀营满族蒙古族乡。后因成立人民公社,这些民族乡曾一度被撤销。改革开放后,先后恢复3个民族乡:先恢复了檀营满蒙民族乡,随后恢复了喇叭沟门满族乡和长哨营满族乡。

北京回族社区的形成源自中亚和西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东迁。回族一般是围寺而居,他们围绕着清真寺就形成了一个回族聚居区。北京市有回族聚居比较多的乡2个、村50个、街道9个、社区居委会13个,共有大小清真寺69座。其中牛街清真寺规模最大,居住的回族有1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上几个北方民族都因历史原因形成了较为集中且沿袭至今的世居社区。而其他诸多少数民族的进京各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因人数较少,没有形成集中的社区,只有相对集中的生活区域,他们大多散杂居于各民族尤其是汉族社区之中。如在清军入关以前,就与西藏地方的格鲁派(黄教)寺院势力集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清朝历代皇帝都曾在北京会见前来朝觐的藏族宗教领袖等重要人物,甚至雍正皇帝尚未登基之前,就将自己的王府分出一半,作为西藏黄教的上院。待其继承王位后,更是将这座庙宇扩建重修,建成了如今的雍和宫。此外,清代称新疆为“回疆”,朝廷专在北京西郊设“维吾尔村”,后改称为“魏公村”,供进京者歇息。如今,北京少数民族居住历史超过百年的世居社区有六个,分别是北京市密云

县满族蒙古族社区、怀柔区长哨营乡满族社区、怀柔区喇叭沟门乡满族社区、宣武区牛街回族社区、通州区于家务回族社区、海淀区门头村苗族社区。人口较多的回族和满族各有自己的以街道、乡村为单位的聚居社区。城区有回族聚居的宣武区牛街社区、马甸回族社区以及满族聚居的海淀区蓝靛厂火器营社区等。还有一些郊区、县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如朝阳区长营回族乡、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乡。全市共有 112 个民族村，其中门头村是北京市唯一的有祖居苗族居住的村落，也是海淀区唯一的民族村。门头村的苗族虽人数不多，但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深的感情，已在这里居住两个半世纪有余。他们原来住在西山的绝地，后来移居至山下。现有 14 户苗族，共计 80 余人。

与上述几个民族不同，更多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北京主要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如朝鲜族是北京目前几个超万人的少数民族之一，而世居东北的朝鲜族大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京朝鲜族一般与其他民族杂居，但也有几个较为集中的生活区域，如海淀区魏公村、中关村和东城区和平里一带，这两个区的朝鲜族人口占全市朝鲜族人口的 58%。丰台区、昌平区居住的朝鲜族也分别达到千人以上。如今北京的望京地区集中分布着诸多韩国公司，其职员绝大多数是朝鲜族。此外，十余年来北京出现的数十家韩国料理店的服务人员也大多为朝鲜族经营，这些掌握着中朝两国语言的朝鲜族同胞为增进中国与韩国、朝鲜的友谊，促进三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的部分少数民族人员因工作关系集中于国家民委辖属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民族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长期从事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关的教学研究、新闻出版、编译编播等工作，形成了一种兼具多种性质的社区类型，我们暂称作“单位社区”。这几个少数民族单位社区都是国家民委直属的特殊部门，是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实施民族政策的重要渠道。他们的工作内容涉及新疆、西藏、吉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的民族事务及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工

他们承担了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现代化人才的历史任务，也承担了将党和国家的声音和书面文献传达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家户户的重要使命。在这几个单位社区工作和生活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均为各民族的精英，绝大多数来自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他们与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言行及态度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社会和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具有流动性的少数民族社区主要是指学生在校上学形成的语言社区以及经商人员聚居形成的社区。如每年都有大批少数民族学生中的佼佼者考入北京上学，组成具有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因为学校是他们暂时的居所，几年之后当他们学成毕业，就会离开学校。然后，又会有新的成员进入学校学习。因此，在校生形成的社区具有显著的流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少数民族青壮年走出偏僻的民族村寨，纷纷涌入城市，从事经商、务工等活动，形成一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大军。这些进城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人员组成另一种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他们在北京已形成一定的集聚地，经营也达到一定规模，例如甘家口、魏公村的“新疆村”“新疆街”。这些流动性的少数民族社区中的成员，一方面保持着浓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最直接、最频繁地与当地文化接触与碰撞；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与同一城市的同民族成员和本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城市中的其他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的不仅仅限于经济信息，还互相传递着包括民族关系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在北京工作生活，为北京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在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各民族散杂居之地。历史上，北京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向北京迁移和涌入的速度也在加快。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北京市有 56 个民族，全市常住人口人数 1961.23 万人。其中，汉族人口为 1881.1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95.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80.4 万人，